

电视剧《走向共和》中袁世凯“改革先驱者”人物形象分析

AN ANALYSIS OF THE PORTRAYAL OF YUAN SHIKAI'S CHARACTER

AS A “PIONEER OF REFORM” IN THE TV DRAMA

“TOWARDS THE REPUBLIC”

陈培培^{1*}, 邢晓姿², 郑清源³

Peipei Chen^{1*}, Juree Suchonvanich², Qingyuan Zheng³

^{1,2,3}泰国商会大学

^{1,2,3}University of Thai Chamber of Commerce, Thailand

Received: March 26, 2025 / Revised: July 16, 2025 / Accepted: August 6, 2025

摘要

本文聚焦电视剧《走向共和》中袁世凯“改革先驱者”的人物形象建构，采用文本细读与影视叙事分析的方法，从剧中军事、教育、警政、宪政及司法等改革情节入手，解析该形象如何通过叙事结构、角色对白与镜头语言得以呈现。研究发现，该剧通过历史虚实结合的艺术表达，赋予袁世凯以制度内改革者的复杂面貌——既有改革魄力与制度设计能力，又体现出官僚理性与现实妥协。此种形象塑造突破了传统形象评价，重构了公众对其改革实践与历史角色的理解，也为晚清制度转型的研究提供了新视角。《走向共和》不仅丰富了对袁世凯影视形象的理解，也展现了历史剧作为公共记忆载体在建构历史认知中的意义。

关键词：《走向共和》 袁世凯 人物形象

Abstract

This study focused on the portrayal of Yuan Shikai as a “pioneer of reform” in the TV drama “Towards the Republic”. Using close reading and narrative analysis, the research examined key scenes involving military, educational, police, constitutional, and judicial reforms to explore how Yuan's character is constructed through dialogue, structure, and visual storytelling. The findings showed that the drama presents Yuan as a complex institutional reformer—pragmatic, ambitious, and constrained—challenging the traditional moral condemnation of him as a usurper. By blending historical fact and fiction, the series

*Corresponding Author: Peipei Chen
E-mail: 815381692@qq.com

redefines public memory and offers a nuanced understanding of Yuan's role in the modernization efforts of the late Qing dynasty. This research contributes to both the study of historical figure representation and the role of television drama in shaping historical consciousness.

Keywords: Towards the Republic, Yuan Shikai, Character Image

引言

作为连接历史真实与大众记忆的文化载体，历史题材电视剧不仅具有传播历史知识的功能，也承载着当代社会对历史经验的再解读需求。2003 年播出的历史题材电视剧《走向共和》，因其对晚清民初关键人物群像的细致描绘及对制度转型的深入呈现，被广泛视为中国历史剧创作的重要代表作。播出距今已逾二十年，该剧在人物塑造与历史叙事方面所体现出的深度和张力，至今仍对历史理解与公共记忆的形成产生着持续影响。尤其在当下影视作品逐渐趋于类型化、娱乐化的背景下，重新审视这部剧中人物形象的构建方式，不仅有助于认识历史题材创作的文化功能，也为理解复杂历史人物提供了新的观察视角。

目前《走向共和》中袁世凯这一重要角色的影像表现，系统性的梳理仍较为有限。相比之下，电视剧《建党伟业》《辛亥革命》等影视作品常将袁世凯简化为“复辟象征”或“工具性反派”的代表形象，他在政治改革中的制度实践和现实考量往往被简化或忽略，导致其改革者的一面在大众传播和影视再现中缺乏足够重视。

本文将以电视剧《走向共和》中袁世凯“改革先驱者”形象的塑造为核心，探讨该剧如何通过叙事结构、镜头语言与人物关系，呈现一个兼具官僚理性与改革意识的多维形象。通过分析影像叙事在真实与虚构之间的表达策略，进一步揭示历史剧在建构公众历史认知中的作用，并探讨这一形象背后所蕴含的文化逻辑与时代意味。

研究目的

本文对电视剧《走向共和》袁世凯进行人物形象“改革先驱者”研究分析。

文献综述

电视剧《走向共和》相关研究

电视剧《走向共和》的背景设定为 19 世纪末至 20 世纪初的中国历史关键时期，为观众提供了一个观察和了解这一时期历史事件与人物形象的机会。

Tu (2016) 指出在历史剧中不同时代的人物建构间出现反差，同时重新建构历史人物形象，能够引发人们的思考，促使其从历史中得到启迪，这对当下的思维有借鉴和反思作用。

历史剧的本质是对大众对过去事件集体记忆的重新建构，今天重看《走向共和》，其在历史剧中的艺术与思想依旧堪称上品，并能作为历史剧重构人物形象的集体记忆的范本”。

Xiao (2003) 指出：“通过电视剧形式，挑战并重新审视了中国近代史上的关键人物，如袁世凯、李鸿章、慈禧太后、孙中山等的传统形象。该剧试图打破由历史教科书长期塑造的黑白分明的人物刻板印象，将这些历史人物以更真实、更复杂的方式呈现，从而引发了广泛的社会和学术讨论。这种新的叙述方式不仅仅是艺术上的尝试，也反映了历史学范式的潜在变化，挑战了传统的历史学思维和意识形态框架。通过这种方式，剧集展示了人物的内在矛盾和时代背景下的选择，从而更接近于历史的真实性。这些尝试和讨论揭示了新一代观众和历史学家对于历史真实性的不断探索和期待”。

Wei (2015) 通过重温该剧，深刻体会到了历史与现实的交织，以及历史的启示意义。该剧通过生动的故事情节和角色塑造，生动地展示了中国近代历史的曲折历程，尤其是共和思想的演变与实践。认为，观看该剧不仅能够了解历史，更能理解历史背后的深层次逻辑和人文精神。还强调了电视剧作为大众文化产品的重要性，认为它能够通过生动的画面和情节，吸引观众的兴趣，引发观众的思考。认为，历史题材电视剧不仅应该追求娱乐性，更应该承担起传承历史、弘扬文化的责任。

Shen (2003) 在学术期刊《站不住脚的理由——简评关于〈走向共和〉的两篇述评》中表示：“清朝的历史，尤其是晚清和民国接轨的这一段，情况错综复杂，迷雾重重。加之近几年“戏说风”的影响，更给正确认识这段历史造成了不少障碍。报刊传媒的文化宣传，急欲对新的文化现象进行解读，这种热情固然难能可贵，但对待复杂的历史事实和历史人物，光有热情是不够的，必须详尽地占有资料，科学地进行分析，慎重地发表看法，才有可能达到支持正确，批评谬误，正确引导舆论的目的。如果仅凭一知半解就盲目跟风，想凑凑热闹，标“新”立“异”，往往南辕北辙，事与愿违”。

Hu (2003) 在学术期刊《〈走向共和〉的启示》中表示：“这部连续剧还给我们很多启示：如虽然改革较之革命更温和，但改革也是要流血的。维新变法中，谭嗣同等六君子为了改革中国的制度付出了自己的生命，付出了鲜血。清末的“新政”也是很不容易的，既得利益者剧烈反弹，几百个京官、上万个外地官员向慈禧太后请愿要杀袁世凯。这部电视剧还有一个重要启示，就是改革还必须及时，如果不及时就会出大乱子。清末的改革就是个很好的例子，我把它概括为“迟到一步的改革”。不是晚清政府没有进行政治改革，但总是改得不及时，滞后了一步。因为改得不及时，所以总不能产生好的效果”。

Fang (2001) 指出：“该剧将以史诗般的艺术笔触全景式地呈现了中华民族推翻帝制、走向共和这一波澜壮阔的艰难历程，集中描摹中国共产党成立前 80 年的中国历史，气势恢宏地再现了甲午海战、戊戌变法、庚子国变、立宪新政、辛亥革命、隆裕退位，缔造共和等重大历史

事件，精心刻画封建统治者丧权辱国、社会战乱不断、国家积弱积贫、人民饥寒交迫等血泪杂陈的屈辱历史卷轴；该剧将浓墨重彩地勾勒晚清封建统治的腐朽以及无数民族精英、仁人志士前赴后继寻找救国救民出路的斗争和探索历程。本剧将着力塑造孙中山、李鸿章、慈禧、袁世凯、光绪、康有为等与以往影视剧中截然不同的众多历史人物的全新荧屏形象。这些历史人物将以人文观照的全新视点向观众展示他们在人类历史进程中，特别是人类思想史的进程中的地位和作用，并将因此而引发今天的人们全新的震荡和反思”。

Xu (2009) 指出，在《走向共和》里，存在长达百年的李鸿章卖国贼形象的社会记忆完全消失了，取而代之的是一个颇具悲壮色彩的民族英雄形象记忆。虽然该剧的主创人员一再表示该剧重心不在于为李鸿章“翻案”，但是，该剧所建构起来的李鸿章形象记忆与以往的社会记忆颇为不同，引起了包括史学界在内的各界人士的广泛争议。

Shao (2004) 在学术期刊《“新保守主义”的集体无意识——解读〈走向共和〉》中指出：“这部号称“民族大戏”的“历史正剧”（此说用来区别于时下流行的“戏说历史剧”）之所以引发激烈争论，主要是因为主创者以有意挑战“官方教科书”的“新历史观”，对从晚清到民国这一地覆天翻、纷繁复杂的历史进程中的一系列重大事件（甲午海战、戊戌变法、庚子国变、立宪新政、辛亥革命、二次革命、讨袁护法等）和重要人物（慈禧、李鸿章、袁世凯、孙中山、康有为等）进行了新的诠释和评价”。

袁世凯人物的相关研究

1. 书籍相关研究：

Liu (2000) 在北京印刷工业出版社书籍《中国大政治家全传——袁世凯全传》指出：“一方面，袁在变法失败后得到提拔重用，另一方面，事隔 10 多年后当了民国大总统的袁世凯又为六君子建祠堂，并一一立传奖恤。在清朝的官员中，最早对“维新变法”有好感，并解囊相助的是袁世凯；最后对他们仍然怀念并付诸实际行动的仍是袁世凯，这都是一个事实。而这个事实最能说明的就是：袁世凯天生对“维新派”绝无反感，就像他天生对“保守派”也没有反感一样。他的好恶、喜厌、支持与反对的唯一标准就是是否对自己有利、自己是否能成为赢家”。

Li (1980) 在中华书局出版书籍《袁世凯传》指出袁世凯的两面派的手法：“袁世凯到小站以后，仍然十分关心京师的政治行情。当时，西太后表面上已归政于光绪，但事事干预，实际上仍握朝廷大权。帝、后为争夺权力，不断发生龃龉，王公大臣中也分化为帝、后两党。帝党官僚同维新派结合，他们的靠山是光绪。反变法的顽固派后面则有西太后撑腰。袁世凯见西太后和光绪都可能提拔他，给他官禄，就脚踏两只船，想方设法谋取双方信任。他不断进京走访顽固派荣禄、刚毅等显贵，百般谄媚邀宠，极尽巴结之能事。尤其是在荣禄担任直隶总督以后，袁经常逗留在天津，与荣禄的关系更为亲密。他曾对徐世昌得意地说：“相待甚好，可谓有知己之感”。同时，他和翁同龢也保持密切联系”。

Wang (2011) 在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书籍《袁世凯全传》中认为：“纵观几千年来中国的改朝换代无一不是流血的暴力争夺。其实，辛亥革命爆发后不久也呈现了暴乱的征象，如果任其发展下去将是一场旷日持久的浩劫。袁世凯的功绩在于他及时地遏止了乱象，而以一种罕见的和平方式结束了清朝统治——当然革命党人的武装起义对促成清廷退位不无作用。应该说，这种和平方式是符合大多数人民愿望的，是符合国家、民族利益的”。

2. 学位论文相关研究：

Wang (2019) 指出：“本文进一步厘清了袁世凯早期政治道路的相关史实，逐渐淡化对于袁世凯的脸谱化认知。作为一个在过渡时代成长起来的历史人物袁世凯同样也拥有着复杂价值取向和处世经验。他热衷于追逐政治权力，如同传统士人一般，那也是他实现自我人生价值的路径。但他的道路除了在政治中摸爬滚打外，也在西方科技的前沿，对现代军事有着亲身体验。此时中国各地虽已有零星的新型军事学堂，但在政治和教育制度变革之前，传统的政治逻辑仍是政治资格优先于职业经验。因此，既往研究以来历史进程及观念，强调袁世凯崛起过程中的军事因素并不合理。拓宽史事考察的时间与方向，重建历史场景，这是历史研究得以近真的正确路径。进入民国后，庞大的北洋利益集团和瞬息万变的政治形势让袁世凯走上了帝制复辟的道路，因此在军事与政治的结合中，袁世凯成了武力政治的信奉者和代表人”。

Liao (2010) 指出：“袁世凯政治思想进行实事求是的评价，一直是一个非常困难而不少人又愿意尝试的问题。早在民国时期，学术界、政界就因为激于道义而给他予以了定性，为他加上了窃国大盗、乱世奸雄、卖国贼等全面否定性的头衔。这其实主要是政治性的评价，其中也不乏意气因素和情感成分。当然，任何事情都不可能绝对划一”。

Liu (2022) 认为：“袁世凯在朝鲜期间的作为，从其所能控制的政治、经济和外交等各个方面一味的去强化其所遵从的中朝间的宗藩体制，以此来维系上国的表面风光。但殊不知这种风光之下的朝鲜早已陷入真正的危机之中，终是无法逃脱中日甲午战争的爆发后宗藩关系被彻底终结的命运”。

Chen (2020) 指出：“袁世凯的地位相对特殊，这是其他官员所不能比拟的，正是对近代教育知识的不断接触以及国内发展现状的综合考校，使其积极热衷于教育事业，以培养具备专业性知识与技能的人才，可以说这是其教育思想上的核心之处。在教育实践上他在担任不同的官职时相继采取一系列举措，如设立新式学堂、颁布法令、派遣留学生、变革科举等，这些措施的推行与当时的社会环境、上层政策、个人思想认知、现时需要等都是紧密相关的，这也是他在教育改革过程中的特色之所在”。

Du (2018) 认为：“甲午惨败，举国震动，这一时期清政府决心彻底地进行军事变革。以“知兵”而得名的袁世凯受到了清政府的重用。袁世凯取得练兵权之后，针对中国军队的弊端有针对性地进行大刀阔斧的变革。变革主要涉及士兵招募、将领选用、军队制度、后勤供给等，

取得了卓越的成果。在袁世凯的训练之下，一支现代化新式军队横空出世，这支军队训练有素，装备精良，后勤井然有序。成为清政府后期统治，所依赖的重要军事力量”。

3. 学术期刊相关研究：

Huang (2011) 指出：“百年前的辛亥，风云变幻，在清王朝大厦将倾的危急时刻，在封建末世已无权臣能力挽狂澜之时，清王朝在各方的呼吁声中起用了袁世凯。就是这个袁世凯，曾经在朝鲜壬午兵变中巧施妙计逮捕大院君、驻使朝鲜不辱使命；在天津小站编练新军，采用德国和日本军队建制，施行步兵、骑兵、炮兵、工程兵等多兵种协同作战的操练方法，开创了中国军队现代化的先河；在百日维新期间当谭嗣同求救于他要他谋杀荣禄进而控制军权、胁迫太后时，他拍着胸膛痛快地答应“杀荣禄如杀一狗耳”，可转身便向荣禄告密。之后他被重用，权势如日中天，大力推行新政，发展工商业；在慈禧太后去世后他被罢官，回到老家，他在彰德洹上村隐居三年，做出一副不关心时政、不愿意复出、归隐山林的姿态韬光养晦；辛亥革命爆发，袁其绝无不忠民国之意，不可猜疑，妄加攻讦，嗣后国民党同志当以全力赞助政府。黄兴在北京也受到袁世凯的热情接待与盛赞，他在南京赞誉袁世凯说袁总统忠心谋国，反不见谅于人，但袁总统未曾因别人的议论而有所不满和踌躇，可见其度量宽宏。这样，革命党人放松了对袁世凯的警惕。革命党人的天真败在了袁世凯的老谋深算面前”。

Zhang (2011) 指出：“其实袁世凯比之慈禧太后和李鸿章还要特殊，他在晚清的政坛上翻云覆雨，权倾一时，先后被吴长庆、李鸿章、维新党人、光绪、荣禄等重要人物所青睐，手握重兵而没有受到狡诈多疑的西太后猜忌，不断予以擢升，在晚清政局中一柱擎天，成为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秉政相国，他究竟有什么过人之处，居然有如此惊人的“骗术”和“盗术”？当世和后世的人众口一词地断定袁世凯“善作伪”，然而，如果人人都说这个人“一生作伪”，仅靠奸诈、贪墨是远远不够的。今日观袁世凯照片，目光灼灼逼人，谁人可比？”

De (2013) 指出：“我国传统评价人物时采取的是道德模式，以品质操行的好坏为评价一个人的标准。依此来看，袁氏无疑是等而下之的了，要入旧体正史中的“奸臣传”之列。世人常常称他为曹操，视其为“奸雄”。这显然侧重在“奸”字上了，言其道德操守之劣。不过，还有一个“雄”字，反映了世人无可奈何的心态和一个难以否认的事实，即袁氏还是有做事才干的。从“奸雄”这一贬一褒两个字的组合看，显示了袁氏身上德与才的矛盾性。所以，后人无论是肯定还是否定袁氏，都要正视这个矛盾性，否则难免片面化。像袁氏这类奸雄是追求自己利益的，可往往又使他能比真正出于本意的情况下更有效地促进社会的进步”。

Zhu 和 Tan (2019) 指出：“袁世凯最终获得练兵权是多种政治势力共同作用的结果，他奔走于多个政治派系之间，得到了各方的一致认同。他在与各派政治势力交往的过程中不仅是只靠阴谋、投机钻营，还有真诚、才干，从他入仕开始，分别在不太长的时间里获得了张謇、吴长庆、吴大澂、盛宣怀、周馥、李鸿章等几乎所有上司和前辈的赏识和提拔。甲午战后袁世

凯积极谋求练兵，又获得了前述要员的推荐，平心而论，他于公于私都有打算，但让各方势力了解自己的军事才能才是交往的主要目的。以上晚清主要政治人物都是袁的前辈，在政坛摸爬滚打了几十年，只靠钻营怕是难以打动的，说明袁世凯确实有过人之处，当然也有机缘在其中，而袁世凯在具有才干的基础上寻求更多的依靠力量，抓住了稍纵即逝的机遇，脱颖而出”。

Su 和 Zou (2013) 指出：“目前，学界对袁世凯的研究已经取得长足进展，其中很重要的一点即对其评价方面。对其评价大致经历了两个阶段：20世纪80年代之前全面否定；80年代以来的评价趋于客观，但也有值得反思之处。至于研究趋势，主要体现为研究内容不断拓展，研究视角更加广泛，研究方法更加多样，史料的整理与运用更加科学有效”。

Tian (2020) 认为：“袁世凯从出山到最后走上帝制的历程中，更多的是基于其对彼时社会形势的判断和为了践行政治构想，鉴于其以北洋集团为后盾所具备的强势力量，这种构想更多地体现在其对民初国家设计和建设方面。袁对国家一统追求的构想从未变更，甚至可以说正是在不断加强该思想的过程中，其在实践上才表现出追求无限加强中央集权，走向帝制自为，逐步偏离了民初主流民意对民主共和的追求”。

综上所述，电视剧《走向共和》自播出以来，因其对晚清民初重大历史事件与关键人物的多维呈现，引发了广泛的社会关注与持续的学术探讨。相关研究从历史剧的艺术价值、思想深度、历史叙事策略以及对历史人物形象的重构等多个层面，深入分析了该剧如何在大众媒介中重塑集体记忆。Tu (2016)、Xiao (2003) 等学者指出，该剧打破了传统历史叙事中对历史人物的单一化刻画，构建出更为复杂、真实的历史形象，反映出当代观众对历史真实性的追求与文化反思的需求；魏大治、胡伟等人则强调其在历史启示与现实借鉴方面的独特价值，肯定了历史剧作为文化传播工具所承载的思想使命；而沈平、邵燕君等则敏锐地指出对待历史题材创作需保持审慎态度，避免戏说化、简化和盲目颠覆的倾向。

同时，围绕袁世凯个人的研究也日益多元化，从政治、军事、教育、思想到外交等多个维度展开系统分析，呈现出其人物形象的高度复杂性与历史定位的多重张力。强调其在维新运动、军事近代化、教育改革及宪政实践中的积极作用，认为袁世凯具备一定的现代国家意识与制度构建能力；也有观点指出其权谋性格、两面策略与独裁倾向，使其改革行为难以摆脱功利性与权力导向。这类研究整体上呈现出由早期道德化批判向多角度历史理解的转向趋势，为研究剧中袁世凯的历史形象提供了更为丰富的基础。

研究方法

本研究主要采用文献分析法与影视叙事分析法。通过中国知网(CNKI)、万方数据库、维普等学术平台，收集与袁世凯相关的学术文献，梳理学界关于其历史评价及影视形象重构的研究成果，为本研究提供理论支撑。

以电视剧《走向共和》全剧 68 集为完整文本，结合剧本台词、镜头语言、角色关系和关键场景，采用影视叙事分析与人物形象建构分析相结合的方式，系统梳理袁世凯“改革先驱”形象的塑造路径。重点聚焦其在小站练兵、推行新政、设立警政、主张废科举、推进宪政改革等关键情节，通过对白内容、角色互动与叙事结构的多维解析，探讨其人物行为逻辑、改革策略以及与传统制度之间的张力。为确保分析的客观性与可靠性，本文还参考剧评、观众反馈等辅助材料进行交叉验证，提升研究结论的严谨性。

研究结果

在电视剧《走向共和》中，袁世凯被塑造为一位具备现代意识、勇于推动改革的政治人物。剧中通过其在军警体制整顿、文化经济建设、教育推动、宪政制度构建以及司法体系完善等五个方面的表现，展现了其作为“改革先驱者”的形象。他不仅善于在复杂政治环境中谋求变革的空间，还展现出在体制内推动近代国家建设的现实能力与制度理性。该剧借助丰富的叙事手法和人物塑造，赋予袁世凯一个兼具实用主义与改革精神的多维形象，突破了传统叙事中对其单一化的权谋定义。

1. 军警改革：

清光绪二十年（1894 年）中日甲午战争后清军的全面溃败，暴露出传统军事体系的严重弊端。面对惨败教训，清廷深刻意识到旧式募兵制度已难以适应近代战争需求，遂将军事改革列为急务。1895 年，袁世凯在天津小站编练新建陆军，剧中通过士兵列队操演西洋战术、装备德制枪械等场景，直观呈现其军事革新。打破了八旗绿营旧制，引入德国教官体系，建立参谋、军医、后勤等专业部门，并推行严格的军纪考核制度。

袁世凯与下属们的对话。**1895 年袁世凯刚到天津小站接任直隶按察史，新建陆军。第一天刚上任就兵营里就一直嚷嚷着要军饷。**

袁世凯：“经荣中堂，李中堂举荐，蒙皇上和太后的恩准，朝廷这次派袁某来小站，是想以驻扎在这里的淮军旧部为底子淘汰整治，操练出一支新式的陆军！诸位！这可是我大清自立国以来，从未有的举措，也是诸位一显身手的好机会，希望诸位和袁某精诚合作，我知道你们关心的是军饷，不过实话实说，我袁某赴任之前，我这龙门也跳了，狗洞也钻了，使出了吃奶的牛劲，才搞到了这足额的兵饷。不过，刚才马三俊兄弟已经说了，圣谕凿凿，军饷乃新军专用，与旧部无关”。

袁世凯从怀里掏出那把左轮手枪，轻轻放在桌上，“我临来的时候，李中堂送了我这个，诸位都是淮军的老兵，这把手枪的来历，我不说，想必都知道，不知道的，马三俊兄弟等会儿给他讲讲。李中堂大人说，这把手枪他带在身边，二十余年未开过一枪。袁某人不敢和李中堂相比，但也想效法他老人家，身怀利器，慎而重之。可是他老人家的器度岂是我这种人所能轻

易学得到的？所以，我希望诸位服从长官，遵守纪律，有什么事不要和袁某过不去。因为你跟袁某过不去，就是跟李中堂过不去，跟李中堂过不去，就是和这把手枪便过不去！我可不想让这把手枪二十多年来从来没发一颗子弹，这第一枪射出来的自当，就落到自家兄弟的身上！”袁世凯是笑着说这番话的，但众人分明从那笑容中，看到了隐然的杀气和逼人的威严！

（张黎，2003，第十六集，30分55秒-34分54秒）

袁世凯在小站接任直隶按察使与新建陆军统帅之初，便面临着军饷短缺、旧部抵触以及纪律松散等多重严峻挑战。然而，他凭借坚定的改革决心和非凡的创新精神，迎难而上。他个人筹措军饷，以充足资金保障军队运转，通过赠送士兵见面礼的方式，笼络人心，增强士兵对新军的归属感和忠诚度。同时，他严格执行纪律，整顿军纪，对不服从长官的士兵进行严厉惩罚，以树立新军的威严。在改革过程中，袁世凯展现出了强烈的创新精神。他意识到传统的淮军已经无法满足现代战争的需求，因此决定以淮军旧部为底子，进行淘汰整治，操练出一支新式陆军。这是一个大胆而前卫的想法，因为在当时，传统的军事观念和体制根深蒂固，要打破这些旧有观念，建立全新的军事体系，需要极大的勇气和决心。然而，袁世凯并没有因此而退缩。他亲自下到基层，与士兵们同吃同住，了解他们的需求和困难，逐步建立起与士兵之间的信任和默契。同时，他还引入了新的训练方法和管理模式，使得新军在短时间内就展现出了与传统军队截然不同的风貌和战斗力。在改革过程中，袁世凯也面临了来自各方面的阻力。一些保守的军官和士兵对新的训练方法和管理模式持怀疑态度，甚至有人暗中阻挠改革进程。但袁世凯凭借坚定的信念和出色的领导才能，成功地克服了这些阻力，推动了军队改革的顺利进行。袁世凯在天津小站的新建陆军改革中展现出了卓越的创新精神和勇气。他敢于面对现实、直面困难，采取实际行动解决问题；他敢于打破传统观念、建立新的军事体系；他敢于面对阻力、坚持自己的改革理念。这些品质使得他成功地推动了军队的现代化进程，为后来的历史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1901年《辛丑条约》签订后清政府的困境，条约第九条禁止清廷在天津驻军，导致八国联军长期控制华北战略要地，不仅使中国主权蒙受“外国驻军治土”的奇耻大辱，更形成列强钳制京畿的军事威胁。在此背景下，袁世凯出任直隶总督后面临三重矛盾，一是列强依据条约拒绝交还天津治权，清廷若强行驻军将引发外交冲突；二是天津作为北方通商枢纽长期脱离管控，严重动摇清廷统治根基，三是民众对“洋兵管城”积怨日深，亟需以主权回收举措平息民愤。袁世凯的突破性改革体现在制度创新与外交博弈的双轨策略——他敏锐抓住条约仅限制“军队驻防”而未禁止“治安管理”的漏洞，于1902年创设中国首个近代警察机构“天津巡警总局”，招募3000名经军事化训练的警员，以黑色制服区别于清军，名义上归属民政系统却实际承担城防职能。

在天津接防仪式上，袁世凯与外国代表公使的对话。背景是 1901 年签订辛丑条约第 9 条规定天津方圆 20 公里内不能给清国驻军。

赵秉均：“报告总督大人，大清国天津巡警总办赵秉均，率队集合完毕”。

袁世凯：“好，执行公务”。

外国一众公使：“这...这是怎么回事?”

外国代表公使：袁大人，按照条约天津不准贵国驻军的”。

袁世凯：“诸位，诸位请安静，诸位看好了，这不是军队，这是警察”。

(张黎, 2003, 第三十集, 11 分 15 秒 - 11 分 49 秒)

在交接仪式上，袁世凯以警察接管防务的既成事实迫使列强承认其未违约。此举产生深远影响，短期内，清政府以“警权代军权”的形式收回天津治权，赵秉均统领的巡警既镇压民众又监控洋人，为袁世凯培植了嫡系武装，1905 年清廷设立巡警部，外交上开创了利用条约字面解释争取主权的先例。但其局限性同样显著，警察本质仍是军阀私兵，助长地方武装割据，列强虽默认天津变通方案，却通过《天津督署条款》等后续条约加强经济控制，更重要的是，这种突破未能撼动不平等条约体系，中国半殖民地化程度持续加深，凸显晚清改革“救急不救本”的特质。袁世凯此举动推动了近现代警察体系的建设，创建了中国警察制度，袁世凯实施的一系列警政措施包括：警察规章的法律化、警政教育的设立、基层警察的创办、警种的多样化、经费来源的筹措等这些规章制度，部分章程甚至至今新中国警察制度还在使用。

2. 文化经济改革：

袁世凯的文化经济改革实践深植于清末多重危机交织的历史土壤，甲午战败后的统治合法性危机催生了体制内现代化诉求，列强资本入侵激发出经济民族主义抗争，而中央权威衰落与地方势力崛起的权力格局裂变为改革提供了空间，在民族存亡与王朝延续的双重压力下，他凭借直隶总督的特殊地位，以实用主义策略嫁接传统与现代，既借慈禧权威将天津警务章程、勸工陈列所等区域改革升格为国家新政，又通过京张铁路、工业展览等实践重塑民族工业话语。

慈禧太后到直隶视察，袁世凯开创中国第一个展览会，以下是慈禧太后与袁世凯的对话。

袁世凯：“直隶总督袁世凯恭迎太后，太后万岁万岁万万岁”。

慈禧：“排场不小啊。袁世凯你可真用了心思了，那几件事办的怎么样了？”。

袁世凯：“回太后，我大清自造的京张铁路臣想保荐候选道詹天佑主办”。

慈禧：“这事我已经准了，你好像还说什么一个什么楼嘛”。

袁世凯：“我大清的邮政楼，正在加紧施工”。

慈禧问天津警察

慈禧：“你们平日都做些什么啊？”

天津警察：“报告太后，按照直隶警务章程天津警察任务是管理交通、清查入口、逮捕盗贼、监管饮食卫生、按时清洁茅房”。

慈禧：“愿不愿跟我到北京去呀？”

天津警察：“报告太后，愿意！”

慈禧：“好…这个好。奕劻，我看这警察比咱们的巡捕要好，你记着，把直隶警务章程颁诏全国”。

袁世凯：“此番太后亲临天津，真是我直隶百官莫大的荣宠啊。请太后为天津勸工陈列所剪彩”。

慈禧：“这是不是个彩，我得看了才知道”。

袁世凯：“赶紧收起来”吩咐手下。

慈禧与一众大臣进入勸工陈列所视察

袁世凯：“太后请，这东西叫缝纫机，它的工作效率是这些手工的两倍”。

慈禧：“这机器也是手嘛”。

袁世凯：“记下来！”吩咐手下。

袁世凯：“太后，比利时电通公司很愿意和我大清合作，这就是他们孝敬太后的，这叫电动灌溉。太后，通过那个手摇电机，把水从井里抽出来，在缺雨的季节给庄稼灌溉。太后将来不妨在宫里装这个，缺雨的时候为太后的花草浇浇水”。

慈禧：“兴一利必生一弊啊”。

袁世凯：“记下来！记下了”吩咐手下

随后袁世凯带慈禧到摄像厅里看摄影录像惹得慈禧开心得哈哈笑声不断。

慈禧：“袁世凯，你这搞得是什么名堂啊”开心呵呵大笑。

袁世凯：“回太后，太后对我直隶的关怀一万年都要留下来”。指的是录像。

慈禧：“这不过是活动的画嘛，你这陈列所里的洋玩意儿，难不成都当画看啊，画饼可不能充饥啊”。

袁世凯：“是，回太后，微臣已经与张之洞联名上了折子，我南北洋都要大搞新政”。

（张黎，2003，第三十集，12分22秒 - 17分57秒）

在这段对话中，袁世凯他既以先锋姿态引入缝纫机、电动灌溉等现代技术，量化效率以推动生产力革新又以旧瓶装新酒的智慧将警察制度、影像技术包装为孝敬太后的传统话语，在保守体制中为现代性开凿生存空间。相较于剧中李鸿章受困于体制的悲情改革者形象，袁世凯展现出更鲜明的行动力与系统思维，通过劝工陈列所的技术剧场将分散的铁路、邮政、警务改革整合为可视化的新政图景，以记下来的应激反应暴露改革者与权力中枢的认知代差，又以联名张之洞大搞新政的政治结盟突破地域性改革局限。这种政治机变与启蒙野心的复杂形象，

颠覆了传统历史叙事中“窃国者”的单向度标签，重构了清末改革者群体中独树一帜的“技术官僚现代性”范式。

3. 教育改革：

1901年《辛丑条约》签订后，清政府为挽救统治危机启动新政，教育改革成为重点。以袁世凯、张之洞为代表的务实派官员，主张废除科举（1905年正式废止）、兴办新学以培养近代化人才，但遭到瞿鸿禨等保守势力激烈反对，后者认为科举维系着儒家纲常伦理与社会稳定，于是剧中有了以下对话。

在御前会议讨论废科举事宜。慈禧太后与袁世凯和其他大臣的对话。

袁世凯：“微臣与张之洞联名上了折子，奏请逐年递减科举，以兴新学”。

慈禧：“递减科举，减到什么程度啊？”

袁世凯：“先减武举，再减文举，直至一切乡会试停止，咸趋新学”。

慈禧：“你的意思是…？科举无用了”。

袁世凯：“这正是臣与张之洞的意思”。

慈禧：“瞿鸿禨，你是个有科举功名的，你的意思呢？”

瞿鸿禨：“回禀太后，新学实学要办，是对的，为我大清广收各类人才也是对的，但臣以为不必废除科举，科举之学，虽短于实，拙于新，但它是我大清人才之根本，人心之正源，决不可废”。

慈禧：“奕劻，你的意思呢？”

奕劻：“奴才赞成袁世凯，科举并非大清起制，从唐朝开始至明朝最盛，但明朝还是把江山拱手送到我大清太祖皇帝手中，可见其乃无用之学”。

慈禧：“你的意思是？新学可以完全代替科举之学啦？”

奕劻：“目前还不能，所以袁世凯、张之洞的折子才说是递减。比如武举如今都是洋枪洋炮，那些骑马射箭，搬石头举磨盘，你一拳我一脚的武举考试，自然是没用了，且各省遍设武备学堂，武举自是即日可废，至于乡试会试，待各省遍设蒙学、小学、中学堂后废除，再废物不迟”。

瞿鸿禨：“但人心之学又有何种新学可以替代”。

奕劻：“人心之学？瞿大人，科举好像没有这个科目”。

瞿鸿禨：“科举没有造枪造炮开矿修路的学问，但定人伦，办忠奸，识道德，正人心却章章在耳。太后，以微臣拙见，新学乃目，科举为纲，目末纲本，纲举目张，且新学乃西学，科举乃中学，连张之洞大学也曾说，‘中学为体，西学为用’，如今竟也要主张废除科举，不知何以出尔反尔，遥想戊戌那年，科举本已废除，太后审时夺势，终又予以复举，圣明所虑，正在人心之失，纲常之变。今臣之所虑，也正在于此”。

慈禧：“袁世凯，戊戌那年你是不是也主张废除科举呀”。

袁世凯：“是，但此一时彼一时，不可比”。

慈禧：“怎么不可比啊？”

袁世凯：“科举牢笼人才自是该废，戊戌年该废，现今仍是该废，本来并无大区别，但当年康党想借着废科举生事，这就跟现在不同了。当年，太后毅然恢复科举乃势所激然，圣明烛照，权宜之计而已”。

慈禧：“今日就用不着权宜了吗？”

袁世凯：“再无权宜之地。微臣研究辛丑之约，庚子年闹拳匪之地，条约规定，不得再行科举，这一条款牵扯北方和西北各省，倘若再行科举，这些个地方人文学士出路皆无，唯有咸趋新学才是正办”。

慈禧：“看来这倒真想个事儿。那么多地方，那么多的人才，不准科举考试，不都憋屈死了”。

(张黎, 2003, 第三十集, 18分50秒 - 23分45秒)

在这段对话中，袁世凯展现了他作为一位具有远见卓识的改革派领导人的形象。他在御前会议上主张逐年递减科举，以推动新学，明确指出科举制度已不再适应国家发展的需求，显示出他对现代化教育的深刻理解和对人才培养的重视。袁世凯批判旧有体制，并非无的放矢，而是基于对国家未来的深思熟虑。他提到辛丑条约中规定不再进行科举，表明他对国家政策的敏锐洞察，并希望通过教育改革来实现国家的复兴。他在与其他大臣的辩论中，展现出开放的心态，愿意听取不同意见，却始终坚定支持新学的必要性，体现了他对改革的坚定信念和勇气。袁世凯的发言不仅反映了他对科举制度的深刻反思，还表明了他希望通过教育变革推动中国走向现代化的决心。综上所述，袁世凯在推动教育改革与国家现代化方面发挥了关键作用，彰显了他作为改革者的责任感与使命感。

4. 宪政改革：

晚清宪政改革发生于 1900 年代“新政”期间，清政府为应对内外危机尝试效仿日本、德国等君主立宪制，以延续皇权。1905 年慈禧派五大臣出洋考察宪政，试图以“预备立宪”平息革命并巩固统治。

袁世凯见慈禧讨论立宪事宜，慈禧太后与袁世凯的对话。

慈禧：“听说你在直隶成立了个宪政研究院”。

袁世凯：“是，微臣请到了一个研究宪政专家”。

慈禧：“是康有为啊还是梁启超啊？”

袁世凯：“微臣岂敢，他叫杨度”。

慈禧：“那就叫你那个宪政研究院迁到北京来，办到朝廷里来”。

袁世凯：“太后圣明”。

慈禧：“五大臣走了快一年了吧”。

袁世凯：“听说他们考察了二十六个国家，一百多个城市，够辛苦的”。

慈禧：“他们走的地方，有那孙文要建立的共和国，有咱们要仿照的立宪国，这几天我是思来想去，你说这两个国家都有什么分别”。

袁世凯：“呃……”。

慈禧：“直说”。

袁世凯：“依微臣之见，这共和国和立宪国都实行的是宪法整治，这就像是一个家，这共和国是没爹没妈的，只有宪政。这君主立宪国有的多出一个爹就像是日本天皇。可有的多出一个妈就像是英国女王，这日本爹的权力大一些，大全统一天皇。这英国妈的权力几乎没有，却要母仪天下”。

慈禧：“你这个比方啊，倒是挺有意思的，可是我大清实行了宪政，你说我是当爹呢还是当妈呀？”

袁世凯：“自然是当爹”。

慈禧：“哟，这到了皇上住的地界了。这当爹的以后还不定是谁呢”。

（张黎，2003，第三十八集，03分23秒 - 05分51秒）

在这段对话中，袁世凯展现了他作为一位现代政治改革推动者的形象，体现了他对未来的深刻思考与责任感。他自信地告诉慈禧太后自己已在直隶成立了宪政研究院，并引进了专门的专家杨度，表明他对宪政改革的重视和积极推动。通过生动的比喻，袁世凯将共和国与君主立宪国进行比较，分析了两者的权力结构，这不仅显示了他对政治体制的深入理解，也反映出他在复杂政治环境中游刃有余的能力。在与慈禧的互动中，他既尊重了她的权威，又巧妙地传达了宪政改革的必要性，暗示她应在新政中扮演更为积极的角色。袁世凯的坚定立场和深思熟虑的言辞，充分展现了他作为改革者的智慧与远见，显示出他在推动中国现代化与政治改革方面的重要作用。这一过程不仅是个人的政治抱负，更是他为国家前途和民族复兴所作的努力，彰显了他在历史转折点上的领导力和责任感。

晚清新政期间的宪政改革（1906-1911年）以“预备立宪”为名，试图通过官制改革重塑权力结构。1906年清廷宣布仿效日本建立责任内阁，实则欲借“立宪”名义巩固皇权。剧中争议焦点围绕废除军机处、设立内阁制展开，袁世凯以“立宪派”姿态主持新官制讨论，主张“当官不再靠出身”，实则借改革削弱满清亲贵权力，扩张北洋集团势力；而铁良等皇族保守派视其为“削权夺位”，激烈反对废除世袭特权。

朝廷大臣在议立宪新官制问题，立宪新官制由奕劻主持，但是临时被他儿子载振叫回家，回去的时候吩咐袁世凯主持。袁世凯与皇亲官员的对话。

袁世凯：“新官制成立以后，行政有了内阁，本来就没有所谓的朝政”。

铁良：“听听…听听！狐狸尾巴终于露出来了，没了朝政，咱们这些个军机大臣，亲王贵胄，也都没了不是？就剩你一个人，你想干什么？”

袁世凯：“懿旨立宪，首定新官制，君子端拱于上不劳而治，内阁操持行政担当一切风险。这些本来都写在预备立宪的诏书中，圣谕煌煌已成根本大法，诏书颁布之日，举国欢庆。诸位军机，诸位王爷也是言之凿凿，千难万险，誓死立宪。可这几天发生的事情，倒让我犯了琢磨，先是千夫所指，我成了百官的对头，继而军机不释，亲贵仇寇，我已是死无葬身之地。为什么？这到底…到底是为什么。我想问问各位王爷，这大清无论如何兴革，首先是你们的家不是？当然是，世凯再想问问各位王爷。大清立宪，是不是为了保你们的一姓君主，绵延万年，没错啊！世凯三问各位王爷，为保君主万年，牺牲一些王爷们的权力和利益，值不值得？值啊。世凯四问各位王爷，世凯总督直隶，官当得好好的，手握北洋，事儿办得舒舒服服的，我干嘛一定要淌新官制这趟浑水呢？不必呀！世凯五问各位王爷，我袁世凯不是那种不识时务，不知深浅，不懂应酬的人吗？我不懂得最粗的腿，是王爷们的大腿，最好吃的饭菜是王爷们的残羹，要想在朝廷上立足，在地方上办事儿，最要紧的就是不能得罪那些军机大臣，要会巴结皇亲国戚，我袁世凯不懂吗？我懂！那我为什么要得罪你们这些个军机大臣，又为什么要得罪你们这些个王爷呢？我疯啦？”

铁良：“好感动人哪。都说袁大人是一代枭雄，今日所见确是一位救我大清的盖世英豪，真是君别三日当刮目相看，可惜，你骗得了别人偏不了我，说一千道一万你们可曾听到袁大人说过一句，新官制的责任内阁里，可有咱们的位子啊”。

袁世凯：“废除军机处，建立内阁制，当官不再靠出身，这是新官制议题中必有之意，懿亲中果然有真才，何患被埋没，新体制刚刚开议，王爷们关心的是如何保住自己的地位，还想靠宗主世袭子孙荫袭，这新官制没希望啦。这立宪，更别提”。

（张黎，2003，第四十集，12分14秒 - 18分11秒）

在这一段对话中，袁世凯展现出坚定的改革决心与深厚的政治智慧。他面对保守派大臣的质疑时，毫不畏惧，勇敢地阐述新官制和立宪的重要性，强调这不仅关乎国家未来的兴亡，也关乎王公贵族的长远利益。他巧妙地运用逻辑与情感劝说对方，指出立宪的最终目的是为了延续君主制，尽管这一过程不可避免地会牺牲一些传统权力。他直言不讳，展现出对改革的清晰认识，并通过幽默和讽刺提醒保守派，唯有顺应时代潮流才能确保自身的未来。尽管面临巨大的压力和风险，袁世凯依然自信从容，表现出超然的政治风范。他的立场与行动不仅为大清的宪政进程奠定了基础，更表明了他在历史转折点上的关键角色，为中国的现代化改革做出了重要贡献。

5. 司法改革：

这一情节发生于1907年（光绪三十三年）晚清“新政”期间的司法改革阶段。清廷为应对统治危机，在预备立宪框架下推动司法近代化，如设立法部、试行新式法庭程序。

有大臣想慈禧参袁世凯受贿奕劻，慈禧下令督察院查此事，任载丰办案钦差。载沣与袁世凯的对话。袁世凯对着下人的手一招手，下人拿进来了现代法院的被告与原告木制牌。

袁世凯：“稟王爷，我大清已有法部，太后也特别恩准本总督在直隶试验新法，王爷即是奉旨，那就是公诉人，即是办案自然是法官，世凯屈为被告，自然是无话可说，特聘我大清原法科进士，现我直隶法治试验局大律师‘曹汝霖先生’为世凯的辩护律师，既为依法办案，王爷和本督都要依法办事”。

载丰：“你直隶有法制，我朝廷有律令，直隶是地方，朝廷是中央，岂可中央按照地方的规矩办。袁世凯！招供吧”。

袁世凯：“被告请律师代为陈奏”。

(张黎, 2003, 第四十四集, 08分55秒 - 09分49秒)

在此段情节中袁世凯面对载沣奉命调查其贿赂奕劻的案件，袁世凯主动引入法治程序，应对权力指控。他不仅将载沣定义为“公诉人”和“法官”，自己为“被告”，还请出了代表现代法治精神的律师进行辩护。这一设计极具象征意义，借用木制原告、被告牌等道具强化法治语境，体现了其试图将现代司法理念引入清末传统审判体制的努力。袁世凯面对王权质询时的回应被告请律师代为陈奏，在形式上打破了传统“口供”与“招供”的封建逻辑，转而引入律师辩护制度，凸显了其作为体制内改革推动者的形象。同时，展现了袁世凯的政治智慧，更体现了剧集借由法律话语的转化，突出袁世凯改革理念的方式。剧中袁世凯通过“戏中审判”转化矛盾，巧妙地将司法改革演绎为一种制度性对抗，使其“改革先驱者”的形象更具立体感与现代意味。

综上所述，袁世凯作为清末民初改革先驱者的形象。在军事领域，他首创小站练兵模式，以淘汰淮军旧部、引入德式训练和现代军制打造新式陆军，通过自筹军饷与恩威并施化解士兵哗变危机。在外交层面，他创造性利用条约漏洞创立中国首个警察系统，以“警权代军权”收回天津主权，开创近代警政先河。在经济领域，他主张“实业救国”，筹办了京张铁路、引入西方先进的缝纫机和电动灌溉设备等举措，系统性推动工商业发展。在教育改革中他力主废除科举、兴办新学，与保守派展开激烈辩论，强调实用人才对国家现代化的关键作用，宪政领域则成立研究院探索君主立宪，以政治智慧周旋于新旧势力之间。在司法领域，他于直隶试点废除刑讯、引入律师辩护和程序正义，以法律对抗皇权干预，推动近代司法转型。这些改革虽面临旧部抵制、列强压迫、保守派攻讦等多重阻力，但袁世凯以务实策略、制度创新和权谋手段推动变革，其军事近代化、警察体系构建、科举废除等举措深刻重塑了国家治理体系，为中国的现代化转型奠定制度基石。剧中呈现的袁世凯并非简单权臣，而是一个在专制土壤中艰难播种现代性的改革实践者，其推动的警务、司法、教育等领域改革具有开创性历史地位，重新审视其改革贡献有助于跳出传统“窃国大盗”的单一叙事，理解清末民初制度转型的复杂性与渐进性。

讨论

电视剧《走向共和》中袁世凯“改革先驱者”形象的塑造，在人物复杂性、制度意识的展现以及叙事策略的使用等方面，体现出与传统历史剧显著不同的表达路径。大量研究表明，该剧通过对人物形象的重新建构与故事情境的艺术设计，突破了黑白分明的史学叙述模式，实现了对历史人物形象的再认识与再想象。

Tu (2016) 指出，《走向共和》作为重构历史人物集体记忆的范本，通过代际差异的视觉化叙述，引导观众在思考中完成对历史的再理解。这种集体记忆的重建并非基于单一评价，而是通过复杂的角色设定来唤起观众的思辨。剧中袁世凯作为制度内部的改革者，不再被简单定义为“篡权者”，而是以其政治理性与策略行动，呈现出一种更贴近历史真实复杂性的形象。

Xiao (2003) 强调该剧打破教科书式的“忠奸二分法”，呈现袁世凯、李鸿章、孙中山等人物的矛盾性与人性面貌。这种写实性的描绘同样体现在袁世凯“改革先驱者”的构建上：他在剧中并非英雄或反派，而是制度推动与政治谋略的双重承担者。这种多维度人物塑造，正是近年来历史剧追求“复杂真实”的一种趋势。

Wei (2015)、Hu (2003) 等人从情节推动与历史启示角度，认为该剧通过情节中的制度改革内容（如司法制度、警政建设、新式教育等）展现了袁世凯推动变革的实际路径，体现了剧作对制度性历史进程的强调。这种处理方式，使人物不仅是权力博弈中的象征，也成为推动历史进程的重要机制。

另一方面，Shen (2003)、Shao (2004) 的批评提醒我们，在面对复杂历史题材时，必须兼顾史料严谨与艺术表达。剧中袁世凯形象虽然具有改革意味，但其言行仍是经过剧作加工与符号建构的结果，不能等同于历史事实。这种艺术化表达必须在文本分析中加以区分，否则容易落入“影像即历史”的误区。

此外，Xu (2009)、Fang (2001)、Shao (2004) 等人对《走向共和》叙事风格和人物重塑方式的研究可见，袁世凯的荧幕形象是导演张黎与编剧张建伟有意识地对传统政治叙事的回应。他们通过叙事节奏、镜头语言与对白设定，将袁世凯置于一个“历史变革的接点人物”位置，从而强化了其改革者身份，并通过法庭式对白、“法制化”场景（如与载沣的审讯桥段）来体现现代政治语言与制度理念的渗入。

综上所述，本文对剧中袁世凯形象的分析，不仅是在补充对该角色的系统性阐释，也是在回应现有研究中对于历史剧人物建构、影像叙事策略与历史理解之间关系的进一步探讨。与以往研究集中于李鸿章、孙中山形象相比，袁世凯的“改革先驱者”形象提供了另一个理解国家建构与政治转型的影像切口。也再次强调，对历史剧的研究应立足于叙事文本本身，关注人物形象如何被塑造、如何在影像中生成意义，而非以史实为评价标准。

总结

电视剧《走向共和》通过严谨的历史叙事与艺术加工，塑造了一个多维度的袁世凯“改革先驱者”形象。剧中袁世凯不仅是体制内的重要政治人物，更是在晚清政局动荡背景下推动制度变革的重要行动者。他在军警整顿、文化经济发展、教育改革、宪政建设以及司法实践等方面的表现，体现出一种立足现实、权衡利弊、因势利导的改革精神。这一形象既区别于传统历史剧中对袁世凯的单一负面描绘，也打破了“历史人物即道德评判对象”的固有模式。

该剧在人物塑造上兼顾政治智慧与制度意识，不仅增强了角色的可信度，也提高了历史题材剧的思想深度与表现力。袁世凯“改革先驱者”的影视形象为观众提供了一种理解制度变革复杂性的路径，也为当代历史题材电视剧如何刻画历史人物、构建历史叙事提供了有益启示。通过对这一人物的深入描绘，《走向共和》展现出历史剧在建构集体记忆、激发历史反思方面的独特价值。

建议

未来研究，一是可以拓展至袁世凯同时代改革者（如张之洞、盛宣怀）的影视书写比较，以揭示晚清现代化动力的多元性。二是可通过跨文本分析，揭示不同意识形态框架下历史人物书写的多元路径。三是研究其他历史人物形象的评价应全面、客观，既看到他的过失，也承认他的功绩。

References

- Chen, L. (2020). *A study on Yuan Shikai's educational thought and practice* [Master's thesis]. Hebei Normal University. [in Chinese]
- De, Z. (2013). Yuan Shikai: A first-class politician. *Lantai World*, (4), 64-65. [in Chinese]
- Du, M. L. (2018). *Yuan Shikai and the modernization of the Beiyang New Army* [Master's thesis]. Tianjin Normal University. [in Chinese]
- Fang, P. (2001). The historical epic Towards the Republic lifts the veil. *Contemporary TV*, (14), 8. [in Chinese]
- Hu, W. (2003). The inspiration of Towards the Republic. *China Merchants Weekly*, (22), 46. [in Chinese]
- Huang, Q. L. (2011). What enabled Yuan Shikai to rise in the late Qing political arena. *People's Tribune*, (18), 78-79. [in Chinese]
- Li, Z. Y. (1980). *Biography of Yuan Shikai*. Zhonghua Book Company. [in Chinese]
- Liao, Z. K. (2010). *The tortuous reflection of China's modern political transformation* [Doctoral dissertation]. Hunan Normal University. [in Chinese]
- Liu, F. (2022). *A preliminary study on Yuan Shikai's actions in Korea before the First Sino-Japanese War* [Master's thesis]. Yanbian University. [in Chinese]

- Liu, H. M. (2000). *The complete biography of a great Chinese statesman: The complete biography of Yuan Shikai*. Printing Industry Press. [in Chinese]
- Shao, Y. J. (2004). The collective unconscious of “neo-conservatism”: An interpretation of Towards the Republic. *Literary Theory and Criticism*, (3), 41-53. [in Chinese]
- Shen, P. (2003). Unfounded reasons: A brief commentary on two reviews of Towards the Republic. *Friends of Newspapers and Periodicals*, (5), 25-26. [in Chinese]
- Su, Q. Y., & Zou, B. G. (2013). Evaluation issues and trends in the study of Yuan Shikai. *Journal of Kaifeng University*, 27(1), 36-39. [in Chinese]
- Tian, Y. F. (2020). Yuan Shikai’s concept of the state and its practice in the late Qing and early Republic periods. *Journal of Anyang Normal University*, (1), 59-65. [in Chinese]
- Tu, F. L. (2016). The reconstruction of collective memory of character images in historical dramas: A case study of Towards the Republic. *Journal of Xinjiang Radio and TV University*, (3), 69-71. [in Chinese]
- Wang, T. (2019). *A study on the early rise of Yuan Shikai (1882-1895)* [Master’s thesis]. Central China Normal University. [in Chinese]
- Wang, Z. H. (2011). *Complete biography of Yuan Shikai*. Guangxi Normal University Press. [in Chinese]
- Wei, D. Z. (2015). Reading history through drama: Reflecting on the classic TV series Towards the Republic. *Organization and Administration*, (2), 61-63. [in Chinese]
- Xiao, G. Q. (2003). The transformation of historical paradigms seen from the character images in Towards the Republic. *Exploration and Contention*, (6), 26-27. [in Chinese]
- Xu, X. W. (2009). Reconstruction of “social memory” in images: A case study of Li Hongzhang’s portrayal in Towards the Republic. *Youth Reporter*, (23), 94-95. [in Chinese]
- Zhang, Y. Y. (2011). Restoring the true historical character of Yuan Shikai. *Human Resources Development*, (9), 108-109. [in Chinese]
- Zhu, X. B., & Tan, X. Y. (2019). Yuan Shikai’s interpersonal relationships and the acquisition of military training power. *Journal of Liupanshui Normal University*, 31(6), 19-26. [in Chinese]



Name and Surname: Peipei Chen

Highest Education: Master’s Candidate

Affiliation: University of Thai Chamber of Commerce, Thailand

Field of Expertise: Vocational Chinese



Name and Surname: Juree Suchonvanich

Highest Education: Doctoral Degree

Affiliation: University of Thai Chamber of Commerce, Thailand

Field of Expertise: Chinese Philology



Name and Surname: Qingyuan Zheng

Highest Education: Doctoral Candidate

Affiliation: University of Thai Chamber of Commerce, Thailand

Field of Expertise: Chinese Modern and Contemporary Literature